

美國與遠東

吳無吾

歐洲戰爭，一行爆發，美國艦隊，即集中於太平洋，在夏威夷洋面上，舉行演習，駐菲列賓的艦隊力量，亦大增加。這時候，人們說，美國對於遠東的態度，趨於強硬；不過，在我們看來，美國的主要目的，是在護衛因英海軍他調而趨於空虛的遠東赤道左近的商路，這樣，美國可以保證南洋羣島一帶的錫與橡皮的對美輸出。及歐戰將及一月，美國總統，宣布凡有侵犯南北美洲者，連英法的殖民地與自治領都在內，美國都將以武力對付。這時候，人們說，美國在聲援西歐民主國家，排拒德義等國在南美與中美的發展；我們說，美國這樣保護美國各獨立國家以外，更儼然以坎拿大與英法在美洲的屬地的保護者自居。

泛美會議之決議與宣言，在劃定美洲的領海範圍以外，還特別聲明中立。這時候，人們說，泛美會議，在使美洲與歐洲戰禍隔離，而我們則注意到會議前美國與南美諸國之改善經濟關係，提出貸款交涉，與會議中，中南美諸國對美所要求借款與商務關係，我們說，在泛美會議中，美國又鞏固了他在南美與中美的經濟霸權，這個霸權，在上次歐戰以後，先被英國奪去，次被德國奪去，旋又在英德爭執之中。在這次戰爭爆發前，美國有識之士，即努力倡議美國對南美諸國貸款，英國人也特別注意美國之向南美出動。現在戰爭爆發了，德國已因被封鎖，而斷絕了對南美的貿易，英國亦因戰時英鎊基礎之動搖，而特別加強其大英帝國的戰時經濟體制，逐漸自南美退出，正好予美國以恢復南美霸權的機會，南美各國，在目前情形下，亦只有向美國低頭。現在成爲問題的，是美國將如何調整其與南美各國的貿易衝突，如何予南美各國以金融援助就是了。

泛美會議後美國一大重要行動，是中立法修正案之通過。本來，在歐戰未爆發前，羅斯福曾提出過，當時經孤立派之反對，未得通過。戰爭既起，羅斯福又召集特別議會，來討論這一法案。在孤立派與修改派之間，本來沒有多少不同。大家都在努力使美國與歐戰隔離，努力使美國不要資助英法作戰。只是孤立派人士，未注意到軍火商人的利益，而堅決贊同軍火禁運，修改派，則面面顧到，

對軍火商人，主張可出賣軍火，對於使美國與歐戰隔離，他們主張禁止美國船隻駛入交戰國，美國人民不得在交戰區域旅行，對於不使美國資助英法作戰，他們主張禁止貸款與英法，禁止募捐。所謂「現款自派」，就是美國修改派的主張，現在，這一法案在軍火商人利益之前，在英法熱望之前通過了。美國可以與歐戰隔離的法令，也由美總統公佈了。但是，這一法案，只能使美國軍火工業，有一戰爭的景氣，只能使美國船隻在某種限制下，轉移國籍，他不能使歐戰展開，他只能使英法加強其長期作戰的信念，加強其經濟封鎖的決心，同時，也可使英法在歐洲的外交戰，可以暫時地緩一下，可以使英法之時感焦灼的外交，暫停一下，根本解決不了什麼問題。

本來，按照法律的觀點看來，大英帝國，既然同德國宣戰，則大英帝國的屬地，與自治領，皆在交戰國的地位上。美國既然要施行中立法，則美國船隻，便不能在大英帝國各部份駛行。因此，在中立法案討論時，美國遠東各地商人，即通電國內，反對將遠東各英領地包括在交戰國內。中正法案公布之日，美總統之命令，也未將遠東英屬各地劃爲交戰區域。這一點，充分指明美國想在遠東尋求其被遮斷的對德貿易，被阻滯的對北歐貿易的補償，商業利益，超於一切。

以上所述，是歐戰爆發美國對於美洲問題及中立法問題的解決。在美國國內討論中立法案時，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回任之後，發表了一篇極其強硬的演說。他說：

美人信任世界各處商業機會之平等，日本雖在中國以外之區域，要求門戶開放且獲門戶開放之惠，然在中國則以此種原則不能適用爲言。即有例外者，亦僅爲肢體不全，生意索然之形式；：日方常作美國朝野不了解東亞新秩序之責言，其實美國朝野了解此新秩序之意義，明白確切，與日本相同。日本官場解釋此新秩序爲安全，穩定與進步之新秩序，此固美國朝野不獨爲自己且爲全世界各國所願有者。然而此東亞新秩序者，顯然欲排除美人在華成立已久之權益，此乃美國人民所反對者也。……此種見解，確實代表並傳達美國朝野之一般感想。美國對於遠東近來發展

之真情，鑄成一致，其所根據者為事實而非宣傳。此種全國一致之真情，乃美政府不能稍加忽視之力量，終必在其政策上與行動上見之。

這一段演詞的嚴重性，遠超過中日戰爭以來美國的幾次抗議，因為在那些抗議中，美國雖然提出事實，但究嫌枝枝節節，並且在那些抗議中，美國始終聲明他們並沒有認為條約不可以修改，不過修改條約，應為雙方討論的，不能以武力片面修改，同時，他們又特別聲明願意考慮日本方面修改條約的具體建議。這時候，美國所爭的，是遠東局勢改變之中，美國應有發言權。今春羅斯福所聲明的，在將來遠東新約勢之討論中，美國必定參加，正是同一意義。美國之廢止美日新約條約，曾聲明因遠東局勢已行改變，故舊約已不適用，那時候我們曾說美國是藉美日商約之談判，可有一機會，與日本討論到遠東新約勢問題。現在格魯的演說，則公然表示其反對日本之遠東新秩序之意思，事後，美國國務院也聲明贊同格魯的說話。這一下，使華僑對美國調整邦交的日本阿部內閣與野村外相，及日本國內，都起了很大的反應。

野村最近又與格魯會議，準備與美國商討一下邦交問題，格魯提出很長的備忘錄，但是在這裏面，我們發現不出美國準備與日本談判關於中國整個問題與遠東問題的內容，而只是要求「日本尊重美國在華權益，督促日本對於各種懸案作具體之解決」，在格魯對野村的當日，各國曾盛傳他會告知野村，如果日本不改變其現在的態度，美國將舉行經濟制裁，不過，他立即加以否認，可見格魯雖然發表過一篇極強硬的演說，近於否認日本的新秩序，但在實際談判中，又表現出美國政府現在還沒有準備，在懸案不能解決時，開始激烈行動。

日本方面，則於肯揚授意之下，由報紙發表意見，對於美日懸案，表示某種可改善，某種不能允許，某種應向重慶政府交涉，至於重要的海關完整與開放長江及其他事件，應向行將成立的「中國新中央政府」交涉。

本來，美國目前對日本的态度，是以對華問題之解決，作調整日美邦交，重訂商約的先決條件。在過去，我們也常常說過美國會以商約作要脅，來討論關於中國的根本問題，來討論遠東新約勢的問題。

現在，日本方面認為美日談判前途希望甚屬渺渺，而美國對於這一談判，又似乎不甚熱心，並且格魯這次提的節略，又遠不如前幾次的覺悟，來得概括，來得有力。這一次的節略，與格魯的演說，也似乎不甚連貫，因此我們懷疑這次美日談判還只是試驗性質，美國還準備立即開始邦交調整遠東新約勢的具體談判，所以，華德曼還很可以作經濟制裁日本的呼籲。在日本，雖然望着對美妥協，但又深恐讓步太多，有失尊嚴，同時，又恐喪失了在中國苦戰二年的戰果。故而他把許多重要問題，留待新中國中央政府來解決，這自然，又是對美國的試探。

在這種情形之下，美日關係的打開，恐怕至少要等中國問題先大體上有一個眉目，成了既成事實時，方能開始。現在，日本把時間已決定，而美國本身，對於這機會問題，似又未注意，他不必然想在政府成立前，與日本先解決中國問題的。因此，美日現在的談判，將行拖延，因是在目前遠東問題，也還不會有結果。

美國表面上對日本態度強硬的结果，在日本國內，固然引起各種反響，在重慶方面，又勾引起不少幻想，英法方面，也因而稍強硬一點，英國外相哈立法克斯宣稱不改變對華政策，英日談判重開，仍以天津問題為主，不發新訓令等等，即其一證。在這一機會中，日本的處境，固極困難，不過，中國的幻想，也終不會實現，英美之強硬，既不會援助中國抗戰，更不會強硬到使日本沒有妥協之可能。因為如此到了那一步，則現在蘇聯之反美，與對日妥協的路線，也就會逐步出現，那時候，受苦的，固然是中國與日本，但美國既然不願戰爭，則歐陸商場緊縮，大英帝國戰時統制下美國貿易所受的損失，也更無從尋求補償，並且隨時還有戰爭的危機，這是英美遠東政策中絕不要的。

總之，在目前，美國對歐陸與美洲的態度，雖已確定，但對遠東問題，美國還在試探。美國還沒有決心現在來開始關於中國問題之根本解決，來討論遠東新約勢問題，因此，遠東問題，在英美方面，目前還不是解決的時機。美國對日態度之強硬，在目前，也只是以使用日本易於接近為前提，而絕不是無限度的壓迫日本使之與蘇聯結合的強硬，這是美國態度的界限。遠東問題的真正解決，尚須中日間先有一解決，然後以中國作為談判中的一份子，方有辦法。(十一月八日)

我們所需要的國家

曾之生

中國國民黨數十年的奮鬥，爲的是要建設一個近代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實態，應該是怎樣的呢？

辛亥革命，封建的君主集權制度雖然推翻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國的形勢，但實際民主革命是沒有完成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發展條件和積疊的基礎，尙未能成熟到使民主共和國堅強充實的程度，結果只有上層的政治結構上，虛懸着一個民主共和國的空殼，社會國家的實質則轉趨爲下列的形態：

(一) 君主集權勢力的衰微和分解，形成地方的軍事割據，軍閥私據地盤，私養軍隊，二十餘年來的內戰頻仍，使國家不能有其正統的統一。民族的國際地位日益卑落。

(二) 民權尙未申展，人民參政沒有實際，選舉制度零亂，且均以賄賂行之，所有國會與其他參政機關，均不過軍人政客的分權奪利之場，與民權行使無干，所以事實上由君主專制下的民權閉塞轉變成民權以侵害民權，其爲禍人民較前尤烈。

(三) 民生日益困苦，這是連綿不斷的內部戰爭與所招致的外部侵略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如無限制不兌現的紙幣之強制通行與割廢，苛捐捐稅的過分強徵，兵燹水災所造成的田地的荒蕪和人民流亡等等；轉造成社會經濟次秩的極端破壞，與人民生活的極度貧窮。

在這種狀態之下，國民黨的發展，一時會遭受着挫折革命建國的事業也未能如願以償，民十三年以前至辛亥革命後的期間，大體是這樣的，民十三年的改組與北伐，便是重新黨的陣營，繼續未完成的事業任務。從北伐到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國民黨在革命建國的事業上，事實上已邁進了一大步，如中央權力漸次膨大，地方的割據勢力逐漸

縮小，公路鐵道交通的發達與全國性的貨幣制度逐漸的完成等等，都是可以值得稱道的。但不幸的是中日兩國失和，引起了兩國間慘劇的戰爭，中國在慘痛的戰爭破壞中，建國的事業，又不得不中途遭受挫折，北伐以前，大體上是中國舊的封建殘存勢力與存在於封建勢力幕後的外力的作祟，障礙着革命建國力量興起，而這次的中日戰事，則係外力直接與中國建國的力量鬥爭，危機是在建國力量的消失，影響到建國事業的中止進行，可能的危機有下列的幾個：

(一) 是中國一部分的土地，有由半殖民地狀態轉化爲完全殖民地的可能。

(二) 尙能保有的區域，因中心力量的消失，社會的次秩短期不能恢復。

(三) 各地因一旦喪失中心力量的控制，仍然要回復到一個分崩割據的狀態。剛近形成的統一局勢，又復解紐。

(四) 新的政權雖然在適當的光榮的條件之下，要產生出來，但很可能因爲外部內部條件的限制，新的政權趨於軟弱。

這都是就現在的狀態可能的對於中國前途的命運之懸測，是中國知識份子所最憂心的幾個問題，戰下去嗎，這種危機很多，和下來嗎，這種危機仍然不減，這是大部人的看法。不過我們就國家民族的利益作整個與通盤的打算而又站在和平的立場來估量時，我們覺得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慮慮這些危機的是否可能，而在乎着力減少這些危機與避免這些危機的努力的方針的確定。

在以前外力沒有大規模進攻時，我們的主要方針，是從內部摧毀障礙革命勢力的封建遺制以發展革命勢力來從事建國，現在的情形變了，外部的壓力直接加之中國，那末我們的主要方針，是要從外部爭

取光榮的和平，以保障革命勢力來從事建國，戰事爆發前後，外部條件毫無爭取光榮和平的隙地，我們提出抗戰建國的口號，在支持戰事的萬分艱苦之中，我們擁護抗戰建國的政策，主張一面抗戰，一面建國，那時的情形是：不抗戰不能建國，而不一面仍然從事建國，抗戰也要與國同歸於盡的，這是當時看不出有第二條可能的路而必須作這樣堅苦的主張，然而戰爭終究是破壞的不生產的事業，而且堅決的抗戰行動也有可以招致外部條件好轉的可能，結果在日本政府聲明以平等合作的原則來結束中日戰爭的時候，我們考慮外部內部的環境，知道日本有和的誠意與需要，中國大部分的民衆也有和的誠意與需要的時，我們又提出和平建國的口號，在惡罵與狂吠聲中，我們擁護真正以民族國家利益爲前提的和平建國政策，我們前後變更，只是因了外部內部條件的變化而變更了我們的政策從抗戰到和平，但始終未變的是我們建國的目標。

我們究竟要建什麼國呢？這個國家以怎樣的精神和實質作本體呢？

第一我們要建的國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是依民族主義對外求中國民族國際地位平等與對內各民族地位一律平等的原則而建樹起來的近代民族國家。牠有獨立的行政主權，有獨立的軍事組織，有獨立的經濟機構。牠不是半殖民地而是一個獨立國家。牠不受任何國家不平等的待遇，但同時却與平等對待我的國家，和平合作，共存共榮。內部諸民族的結合關係，完全基於平等自由的原則之上而爲各個民族一律平等的自由統一國家。

第二我們要建的國家是一個民權主義的國家，以普遍的民權專予全國民衆，使能充分地行使選舉權與罷免權以參加行政，管理行政，使能充分地行使創制權與複決權以制定法律，改造法律，人民在政治法律上的地位一律平等，由於這四權的充分行使，保證這個國家，完全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這便是民權主義所揭示的人民有「權」的原則

，至於行政的人選與法律的制定一經確定之後，便交由政府全力執行，結果保證這個國家，又是一個集權的國家，這便是民權主義所揭示的政府有「能」的原則。二者相互爲用而形成一個活潑敏銳的民主集權的機構。而使他的行政效力和技能可以無限制的發展。

第三我們要建的國家，是一個民生主義的國家，這個民主主義國家的體制的特徵是（一）國家資本和國家實業（包括工農礦與交通運輸各業）佔主導的地位，沒有社會上私人資本家壟斷的弊害。（二）在國家資本和國家實業占主導的前提下，並不否認私有財產制的存在，和私人資本的活動，使其在中國社會條件的需要之下，盡其活潑經濟的作用，（三）促進全民分工合作的共同勞動體制，使不勞而獲的絕跡，而勞動一定可以生存，隨着物質條件的改善，衣食住行育樂，可以漸進而即於高級的享受。這就是說：國家對於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負責保證，保證工人有工作，農民有地耕，而義務學校的設施，保證任何貧寒的子弟，都可以有接受文化教育陶冶的充分機會。

這便是一個完整的三民主義國家，牠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共產主義的，而完全是由中國客觀社會條件所要求着而爲我們所必須勤進的事業。

國民黨的人站在黨和主義的立場，適應着中國客觀存在的社會要求，對於建樹上述規模的國家任務是責無旁貸的。我們從前主戰，是要從抗戰中來建立這樣的一個國家，我們現在主和，是要從和平中來建立這樣的一個國家。無論何時何地，國民黨的人甚至於黨外的明識之士，都不能忽視這一事業，因爲牠的本質是富於全國一致性的，中國如果不能建樹起這樣的一個國家，牠不是滅亡，就只有一個無次秩性的混亂的前途。

這種事業的完成，是須要長期間的努力的，懸此以爲鏡，正待我們舉國上下并力以赴。

民權主義的政治制度 (中)

白瑞光

(c) 創制權——罷免權是對人的，那是人民控制官吏的辦法，國家除了官吏之外還有甚麼重要東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謂有了治人還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作創制權。(「民權主義第六講」原來議員或民選的官吏是代人民辦事的，人民要辦的事他們不去舉辦，人民本可以罷免他，但是國家政事經緯萬端，若因一件事或一個法律案的沒有製定便罷免一個費許多金錢與時間選出的人來，未免太易動搖了。況且，所謂不辦事常常不是議員某一個人的責任，而是議員全體的责任，罷免議員全體當然有許多不方便。人民有創制權便可救濟這種弊病，那便是不用議員，人民自己去創制一種法律，這是人民直接立法的理由。

人民直接立法起源於古代希臘的城市國家，那時候所謂公民全體(公民指自由人而言，奴隸不在內)相當於現在的議會，執掌立法大權。古代城市國家其公民人數不多所以行這種制度，近代瑞士美國各州也有一種人民直接立法，但這種制度究以行於區域極小之社會為宜，因此，總理把人民直接立法之創制權複決權確定於兩個範圍內，一個是「縣」一個是「國民大會」。中國人口那樣的多，地域那樣的遼闊，交通又不便，若以全國為單位行使人民直接立法權顯有困難。「縣」是最小的行政區劃，縣行政對於縣民有切膚之痛，最宜於直接立法。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國民大會的人數也不太多自可運用自如。不過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由國民大會的代表來創制法律，與人民直接立法有別，代表與議員相當而非人民的本身。這個可以這樣解釋，就是國民代表以平民的資格來行使創制權，並非以代表的資格創制法律

。因為這樣所以在國民大會開會時其他非國民大會代表的平民也必須有通過國民大會的創制權。可以用法律規定公民若干人的連署或附議的創制建議案可以交國民大會，其效力與國民大會代表所提出之創制法律案完全相等，這樣人民的創制權才可完全無缺。在人民的四種政權中以創制權為最特殊，因為選舉，複決與罷免祇是「可決」或「否決」的投票，參加可否投票的公民人數可以多至幾萬或幾十萬。在創制權的行使却不同了，如草擬一個法案或法案修正案決非數千萬人共同的行為，這非授權少數人辦理不可，所以就是現行代議制中的議會也非授權於小組委員會辦理不可。不過議會小組委員會草擬的法律案或法案修正案還可交全體大會修正或逐條通過，這在人民直接創制時幾千萬人的大會却是辦不了。因此我們主張人民對中央法案的創制，由人民建議或要求複決，但創制法案的技術工作可授權國民大會。所謂技術工作如按人民擬定的原則擬制法律草案或修正法律條文或用語上的技術性質，以期實施時能順利施行。

關於創制的範圍各國的制度不同，有所謂「制憲的創制」與「立法的創制」二種，我們主張二者一並採用。二種創制權既非衝突，自可並行以充分發揮民主精神，並且，在制憲時人民既有參加制憲的創制權，則此後人民直接創制的法律自不能變更憲法，也就是雖然人民直接創制的法律案，如與憲法抵觸，法院也可解釋其為無效。如此人民直接創制的法律案與議會的立法其效力完全相等。另外關於創制權的形式各國現制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公民祇建議幾種立法原則，再由議會依據此種原則製成完整之法律草案，一種是公民自己製成一部完整的法律草案。前者之弊，公民所提之原則易被議會曲解或修正，甚或議會制定之法律與原則完全相反。後者之弊是因公民多無立法技術

上的知識與經驗，所製成法律之內容易流於草率粗疏。我們主張採用前者而以後者為保留之對抗權，即每一個公民直接創製法案公民必先建議幾種原則，原則不厭其詳，然後交議會製成法律，製成後再交原創制之公民複決。如果複決的結果可決了議會製成的法律，便是原創制公民認為議會製成的法律與原建議的原則相符，此法案自可公佈施行。即或議會有所曲解與修正，但經過原創制公民的複決，也便是原創制公民認其解釋與修正為是。如果複決的結果否決了議會製成法律案，原創制公民便可自己擬製一種完整的法律草案。第一次必須經過原則的建議可免去草率與粗疏，保有了否決後人民自製法律的對抗權，議會便不敢違反人民所擬的原則，則兩制之長可以兼採。

創制權運用不當易生流弊，一種流弊是由創制權本身的缺點而生，一種流弊是由創制權被人濫用而生。創制權本身的缺點是，製定一種法律與罷免官職或表決議案不同，製定法律即草擬原則也必須公開討論，但討論非幾千萬人短時間內所能濟事。（這種困難前面已經提到。）不能充分的公開討論，很容易由社會上少數有政治、經濟或他種地位的人創制了關係全國的法案。防止這種弊端必須充分利用報紙，由國家舉辦一個極普通行銷全國的報紙，給人民一個書面上辯論的機會，一面把建議成立提案與付表決間的時間距離拖長，以便使人民對於提案的兩面有充分的理解。除登報外更可由提案之贊成與反對雙方把他們的主張印成傳單或小冊子普遍的散發予公民全體。贊成者與反對者更可公開演講，廣播講演，在電影銀幕上講演以便取得多數公民的同情，如此創制的公民雖不能集於一堂作言辭的復辯論，但可用書面的辯論開發真理，則弊端自可減少至極限。創制權濫用的惡果是動搖固定的國策，減低行政效率，使國家政策紛歧不能一貫。防止這種弊端單靠法律的力量是不够的。法律可以規定連署人或附議者須有公民高顯的比率，議案方能成立，非全縣或全區絕對多數之贊成投票不能創制法律，複決亦同。除法律之外更須使一般人民知道創制權

的效用甚大，但濫用起來其危險亦大，人民有了較高的政治知識，便不會濫用。如瑞士和美國諸州人民雖然擁有龐大的創制權，但非至不得已時決不輕易使用。論至此地我們愈知總理訓政時期規定之價值了。

(D) 複決權——創制權之目的在防止議會不制定某種法律，乃由人民自制。複決是由公民對於議會已經通過之法律案或憲法案為贊成或否認之表決，其目的在防止議會違反民意而制定某種法律。總理說：「又如立法院任立法，人民覺得不便，可以公意起而廢之，這個廢法權叫作複決權。又立法院如有好的法律通不過的，人民也可以公意贊成通過之，這個通過不叫創制權，仍叫複決權。因為這個法律仍是立法院所立的，不過人民加以複決使他得以通過。」（十二年廣東省教育會議五權憲法）這種說明最為清楚。複決權與其他直接民權一樣，其功用在於防杜議會的專斷與失職，人民保有此種議會不公然違反民意，倘而違反民意用複決手段亦可救濟。複決為公民對法律之批准權乃真正人民主權之表現，可增長人民對法律的責任心，就是自己批准的法律自己必須遵守。

複決權的形式有各種，有所謂制憲的複決與立法的複決，制憲的複決是對於制憲案或憲法修正案必須交人民複決的制度，這種制度最宜採行，因為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近世憲法上重要規定是人民之自由權利與義務，自應付人民複決，同時憲法的制定與修正機會不多，時間較久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投票自易施行。立法的複決是對於議會通過之普通法案的複決權，這種普通法案的複決，必須出自由複決的形式，就是對某法律案遇有公民要求或關係機關有所爭執不能解決時再交公民複決。否則每一法律案都交公民複決，頻頻舉行大規模之投票既不可能，而公民複決代替了議會的表決亦嫌越俎代庖。因此近世各國對普通法案多採自由複決之形式。自由複決是與強制複決相對待的形式。強制複決是以法律規定凡議會制定之憲法案或普通法律案必須交由公民複決始能生效。對此種強制複決制度我們主張祇可適用於制憲案或憲法修正案。自由的複決是凡議會通過之憲法案或法律案非經公民自動要求或其他機關自動要求者不交付公民複決的制度。這種制度可適用於普通法律案，前已論及。自由的複決在下列三種情形下最為有用，第一而最重要是的人民不信任議會時人民自動要求的複決，

這種前述制制同，即人民對於議員的不信任不在一人一均問題，祇在某一法案的問題，連未至有罷免的需要時，可要求將此法案交付公民複決。實行此制須以法律規定一種法案在議會通過後一定期間內，若干公民之聯名要求須將此法案交付公民投票表決。此通過後之期間如太短則人民無充分瞭解的工夫，如我國土地遼闊，交通不便，非於政府公報到達後再經過一定期間始不情事。但議會通過後之時間太長則一種法案其效力久不確定，易生變化，如有時間性的法案更非從速確定不可。於此益見廣土眾民之國家實行直接民權非將其範圍縮小不可。地域縮小則時間可以節省，而可以規定較短的時間距離了。又若干公民之聯名要求，此聯名之公民究應規定若干？如將此聯名之公民人數規定太少，便是國內一小部份公民也可以變更代表全國人民之議會通過的法案，如將公民人數規定稍高，則徵求此多人之簽名又極困難。德國規定全國公民二十份之一可以要求複決，其二十份之一為一百數十萬。中國若規定為四十分之一也要有一千萬了。這一千萬人的簽名如何徵求顯為不可能。所以總理把直接民權僅授予縣公民對本縣的政治行使並授予國民大會對中央政治行使，而不主張廣泛無限制的濫用，其理由至為充足。第二是議會（即總理所說之立法院）中少數的議員自信其主張可代表多數民意而受議會中多數議員之壓迫時，有訴諸公民之機會。我們知道議會中絕對多數之議員未必能代表絕對多數之民意。譬如某國有國民一千萬人選出議員二百人，其中就選失敗的議員定有很多，假設有二百萬人所推舉的議員沒有當選，那麼便是當選的二百個議員祇能代表選民八百萬人。假設在議會中一百零二個議員贊成一法案，這自然絕對多數了。這一百零二個議員按比例祇能代表國民四百零四萬人。在一千萬國民中四百零四萬人的意見能算多數人的意見嗎？可見議會中絕對多數通過的法案也常常不能代表多數國民的意見。在上舉例證中五百九十六萬的意見將被四百零四萬國民的壓迫而犧牲，這是現行代議政制沒有直接民權制的最大弊端。倘若有了複決權，則議會中少數議員可以要求交付公民複決，複決時五百多萬國民自然可以對抗四百多萬而實現其主張。所以在自由複決制下少數議員的主張有訴諸公民的機會，也就是真正多數民衆的意見可以發揮出來，這才配稱爲民主。第三是在議會兩院制國家，上下兩院之衝突，或在總統制國家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衝突不能解決時，可用公民複決以解決之。我國立法院不採兩院對前者可以不論。

總理所主張中國將來之政制近似總統制。因大總統與立法院代議士均爲人民直接選出，而大總統不向立法院負責，各部又向總統負責，其制近似總統制。詳見下章。在總統制國家總統不向立法機關負責，而直接對人民負責，議會也直接對人民負責，因此立法機關不能倒閉，行政機關也不能解散議會。立法機關對付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對付立法機關的方法，除了等他任期滿後運動人民不再選外則祇有革命。因此總統制國家，總統如與議會衝突，在合法條件下無法解決。倘若實行自由複決制則總統與議會均可要求將他們的意見或法案交付公民複決。他們既均對全國公民負責，則公民擬定的可否在法律上他們非遵從不可。因此自由複決權又是解決對立民選機關的衝突之妙法。這以我們對普通法案主張採用自由複決制。

以上四種政權是人民控制政府的武器，有了這重大的武器，人民可以操縱政府，運動自如。總理說：「……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這兩個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這是怎麼意思呢？好比十萬匹馬力的輪船機器，那架機器能發生十萬匹馬力來運動輪船，這便是機器本體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樣，這種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權。至於這樣大的輪船，或者是要前進，或者是要後退，或者是要向左轉，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師……這種開動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輪船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樣。這種管理的力量就是政權。」（民權主義第六講）政權好比工程師的力量，治權好比機器本身的力量，選舉權好比開了機器的電鈕叫他工作，罷免權好比關了電鈕叫他停止工作。倘若應當向右轉了他還沒有轉，叫他向右轉。他走的太慢了，叫他慢，這好比運用創制權自製法律，運用複決權決定可否。沒有直接民權的民主是虛偽的民主，沒有直接民權的國家，人民控制政府的力量太弱，幾等於無。因爲人民無力控制政府所以怕政權力太大，天天在想法限制政府的行動，結果阻礙了政府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效能。歐美學者因此懷疑民主政治，於是他們說：「鬼魅的民衆」一見浦來士美國民主論。他們說民主政治減低了行政效率等等，這都是由於他不知道「權能區分」的原理。把人民的政權與政府的治權區分開來，是民權主義之最大供獻。

中國怎樣擔負世界史的使命

宗嗣琮

中日問題的合理解決的急切需要，逼迫着許多人，尤其是兩國的知識分子都不加以嚴重的注意和討論，這是可喜的事情，因為對這問題既有了嚴重的注意和討論，自然可以藉此漸次獲得解決的正當途徑，這對於中日兩國的前途是有利的。

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以為要有下列的兩種態度。

第一是立論必須照顧到中日雙方，換句話說：即是要顧及雙方的共同利益與雙方的立場。

第二是必須互相糾正偏頗的言論，剔除某種隱匿于狹隘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不自覺的錯誤，進而掃除中日問題合理解決的障礙。

這兩種態度，我認為是知識分子討論這個問題的任何方面如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都必須嚴格的保持的態度。有第一個態度，一開始討論，就可以有自我的公允的論據，有第二個態度，即使稍涉偏頗，也可以由相互間的批判得到改正，這都是兩國知識份子的責任，知識份子雖然不能代表一個確定的社會階級，但他對於其他各階級的人們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偏頗的立論，有時無形中便作成了解決中日問題的障礙，這是值得審慎的。

現在我們姑舉一種的論調來一個討論的例子。

在近術的聲明裏本來就有要求中國分擔東亞建設與維持東亞秩序的責任，所以接續來的便有許多進而討論到中日兩國擔負世界史的使命的問題，在這種命題之下來討論兩國的關係，如富田清之助先生最近在中華日報上（本月九日）發表的「中日兩國所負世界史的使命」一文，就是在上述趨勢下的產物，我們很清楚知道，富田先生寫這篇文字的時候，一定是抱着前說的第一個態度的，但為着使這問題能

更進一步地開展起見，我們還需要用第二個態度來討論牠。

首先富田先生對於「用世界的理想的金字招牌所粉飾的素樸的國際封建主義」加以非薄，並對於剝奪對方的國家的人格與弱肉強食的侵略行動加以攻擊，這無疑是懷有真正世界主義的崇高的政治理想的，接着并說：「對於喪失了世界的原理而彷彿着的歐洲，加以救濟乃是東洋之使命，有深長意義，比之由分割波蘭所表現的弱肉強食之歐洲的現狀，東洋的理念如何崇高。吾人深切體驗着。」這無論將來現實的事態是否可以證明這一東洋的崇高理念的真實的存在，但富田先生竟能忘懷人所蘊的國家功利主義而來提及這種理念還是十分值得稱道的。

但接着一般理念的論列，富田先生提到了軍國與黨政的這個實際問題，在這裏，我們以為有略加商討的必要。

該文說：

「中國新政權無兵力，以日本之兵力替代其任，就世界之政治現狀而論，是必要的，也是立脚於中日共存之宿命性的當然之行為。」

忍受多大之犧牲，以百萬之大軍懸軍於大陸，在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草創時期，乃不可避免的事實。

因為無兵力的政府必歸於覆滅，乃是世界的政治狀態之故。」

關於這一點我們的見解稍異於是：第一我們認為兩國兵戎相見，一國以其兵力入佔於另一國的領土之裏，這只是兩國間一種反常的狀態。而兩國間的軍隊各固其固，從而以各不相侵互相尊重的親善精神為紐帶，則是正常的狀態，兩國一旦釋仇言和，則應即由反常的狀態

回復到正常的狀態。第二就中國新政權的產生而論，牠的產生純粹是根於中國社會的需要和人民的意向的，而且要在外部條件可使中國獲得光榮的平等的和平才有可能的。牠不能只着成爲在日本兵力掩護之下的一個產物。因爲牠如果沒有內部的基礎的話，牠很難有健全的發展，牠的軟弱的狀態，將使牠不能擔負所謂「世界史的使命」，又如果牠不能有權建設自己的軍隊，而要長期地「以日本之兵力替代其任」的時候，那末牠的實質不能代表國家，而且這個國家「不具新國家的人格性」，因此也不能作爲「亞洲之新的出發」，而表現出「美的東洋之姿態」。

一個國家要具有人格性，牠要有下列的幾個條件，而一個政府要能存在，要能使國家具有人格性，牠要使下列的幾個條件成爲可能。

(一) 獨立的行政主權。

(二) 獨立的經濟結構。

(三) 獨立的軍事組織。

(四) 獨立的文化思想。

中國新政權的誕生，就我們的立場而論，是不問時間只問條件，只問如何適合中國本身的需要同時也能促進日本的正當利益，而不問其前途是否要因其種原因而趨於顛覆。因爲如果忽略本身需要的條件，即使本身有軍隊也要顛覆的，歷史上不乏有軍隊而顛覆的政府，更何況軍隊還不是自己的呢？所以我們認爲以日本之兵力來代替中國新政權不應擔負軍隊的任務，不能認爲是「立脚於中日共存之宿命性的當然之行爲」。而只能認爲一種暫時的反常的偶然形態，新政府必須有充分自衛軍隊的自由，自盡其任務，使國家的人格性完善。這樣，才能與日本共同擔負世界史的任務。

復次該文又說：

「汪先生領導下之和平救國運動不作一黨專制脫却黨派的意識形態，也是因其認識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世界的原理之故。」

如一黨專制之類的狹小的封建政治家之意識，以世界的現狀判斷之，不但欠妥當，且非可以創造新時代之政治體制，」對於這一問題，我們認爲也有補充和說明的必要。

第一是汪先生所領導的和平救國運動雖然不作一黨的專制，但却是一黨的中心。即是以國民黨爲軸心的一黨中心。客觀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中國國民黨是由中國社會條件的需要之下發展出來的唯一大黨，所以無論和戰都要以牠爲中心爲主體，這是客觀的需要，並不是國民黨主觀的爭取。

第二是以一黨爲中心執政，有時甚至以一黨專政，也並不是狹小的封建的意識。這要看這個黨與社會的依存關係如何，如果這個國家的社會基礎，決定着這個黨爲唯一的存在，而這個黨的本身又正代表着國家民族的整個利益時，那末以牠爲中心甚或專政，有時都成爲必要的與新的政治體制的建樹沒有妨礙。反之如果這個國家的社會基礎，決定着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黨均有勢均力敵的發展，那末某一個黨要求作爲國政的中心與妄圖樹立一黨專政的政制，事實上不但不可行，而且足以召致禍亂的。因此，一黨中心或一黨專政究竟係狹小的封建意識之表徵與否，不能求之于黨政的外部形態，而須看黨與社會依存關係的實質以爲定。

總之中日兩國應該共同擔負世界史的使命是無可懷疑的，也是兩國進入於世界史的領域中必須盡盡的任務。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由于國力的逐漸強盛，已有充分的資格擔負這個任務，中國呢，革命運動的興起與民族意識的發揚，正在極力的要求這個資格，我們站在中國的立場，歡迎友邦人士誠意地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也要時常提出這個問題的意見，而且還要不吝氣地糾正有意或無意的偏頗意見，因爲這問題，對中日未來的關係太大，對亞洲前途的關係太大，對於我們國家前途的關係尤大，我們絲毫不能忽視。我們友邦的開明人士，也必可給與深切的同情和瞭解的。

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五）

望雲
寄自內地

十一 各黨各派

自北伐以來，國民黨掌握了中國的政權，這是國民黨數十年來的光榮歷史，廣大的羣衆基礎，博大精深適合國情的主義造成的，也是由革命行動而獲得的支配地位。國民黨以外的所謂各黨各派，有名無實者居多，最大的「政黨」算是「中國共產黨」。共產黨與國民黨作政權的鬥爭，擾亂近十年，禍及十多省，終於禁不住大軍的圍剿，所謂「紅軍」也者，開始其流寇式的長征。長征到了陝甘一帶，偏促一隅；成了奄奄一息的殘中之鱉。西安事變發生，共產黨得乘機坐大，抗戰發生，更給共產黨以割據的機會，共產黨也趁着抗戰的混水，大摸其魚。一方面向在朝的國民黨要求政權，一方面在地方上擴展其割據的勢力。

對內對外是一個政府的兩面，對內用力過多，對外的用力就少些，反之亦然。前些年是「攘外必先安內」，在「安內」的政策下，共產黨開始其逃往的疏離，自吹曰長征。抗戰發生，國家悉力對外，對內的統治已無形弛緩，更加爲集中對外的力量，對內不免故施寬大。而一般在野黨趁着中央悉力對外時，企圖活動，也以集中對外的理由要求在朝黨的讓步。在當政者施寬大，在野者要求參加對外鬥爭時，有了所謂各黨各派的出現。各黨各派既然出現，各黨各派怎樣合作呢？於是有所謂「統一陣綫」與「聯合陣綫」的口號爭執。所謂「統一陣綫」是以大併小，大者領導小者之謂，領導者是大者，中心力量也是大者。中國各黨派中，力量最大，人數最多的是國民黨，國民黨又是在朝黨，當然是各黨派的領導者，當然是統一各黨派的領袖了。所

以在國民黨看來，當國家對外作戰時，一切需要統一，各黨派都應當服從國民黨的領導，統一於國民黨的旗幟之下。國民黨對各黨派所謂的統一，無異是一種收容，同情國民黨者，莫不贊助所謂各黨各派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組成「統一陣綫」，一致對外。

所謂「聯合陣綫」是在野黨，尤其是獨霸一方的共產黨所唱的高調。「聯合」與「統一」不同，統一是以大併小，小者服從大者，受大的領導。聯合有平等的意味，是勢均力敵，旗鼓相當的各黨派，平分一切。這當然對於在野的黨派有利，因謂在野的黨派手中既無政權，人數又極稀少。不利於國民黨，所以此種論調與合作方式不爲國民黨所容。在西安事變以後，直到七七事變爲止，是「統一陣綫」與「聯合陣綫」間的最熱鬧的時候。事實勝於雄辯，抗戰開始，力量最大者，掌握政權者自然握得領導權，在野黨雖想不被統一也不可能了。抗戰促成了統一，不管統一的內幕如何。

在統一對外的口號之下，黨禁無形解弛，各黨各派不僅可以公開活動，而且各黨各派的負責人漸由野而入於朝，參與國家大計的研討了。因此，所謂救國會的七「君子」保釋出獄，著名托派領袖陳獨秀獲得特赦，「中國共產黨」發表信仰三民主義的宣言，蔣先生發表容共的談話。各黨各派的合作，形成南京成立的「國防參議會」，這個會議包括政府的重要領袖，及各黨各派的負責人，主席係蔣先生，副主席係汪先生。所謂「君子」也者也有幾個人微倖入選，在他們及他們的朋友莫不彈冠相慶，在旁觀者看來，莫不有昨爲階下囚，今爲坐上客之嘆。「國防參議會」的組織是半公開性的，職權如何，人選如何，內容如何，至今尙未有可資依據的文件發表。

各黨各派合作的表現，在南京是「國防參議會」。南京危急，政府西遷，政治軍事中心移往漢口，各黨各派的合作又進了一步。人的欲望總是沒有盡止，所謂在野的各黨各派也是得寸進尺，得隴望蜀。國防參議會大概是政府的設計諮詢機關，沒有決定權，久之各黨各派漸感不滿，於是在漢口有所謂「加緊各黨各派的密切合作」，「改革政治機構」的呼號都是不滿的表現。國民黨到底寬大為懷，對於在野黨的合理要求，總是曲予容納。二十七年三月國民黨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武昌，據傳主要議題是各黨各派合作的辦法。還傳說各黨各派準備發表宣言，自動解散，國民黨由大會議決擴大組織，吸收各黨各派的份子參加，組成新的中國政黨。據傳這個擬議事前已獲得中國共產黨及各黨各派的同意，單等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決定辦法，即可開始組織。誰曉得，事到臨頭共產黨變卦了，反對組織中國統一的新黨辦法，國民黨也無法再在臨時代表大會中商議，但仍在臨時代表大會的宣言上舉嚶鳴求友之意，昭示海內，希望各黨各派加入國民黨。宣言有一段的大意是這樣：爲了實現三民主義，爲了國家民族的復興，希望全國有志之士，一致加入中國國民黨共同奮鬥，當初爲欲推翻滿清政府，賴有志之士一致加入，卒將二百年來的專制局面推翻。其後舉行北伐，完成統一，也賴有志之士一致加入，而獲致成功，今當抗戰建國之時，工作較前更重大更艱難，當然更希望全國有志之士共同加入國民黨一致奮鬥了。在抗戰建國綱領的前文上也說得明白：「中國國民黨領導全國從事於抗戰建國之大業，欲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固有賴於本黨同志之努力，尤須全國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負，因此本黨有請求全國人民捐棄成見，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統一行動之必要，特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製定外交及軍事政治經濟民衆教育各綱領，議決公佈，使力量得以集中團結，而實現總動員之效能」。國民黨於期望全國有志之士共同加入國民黨以外，更議決設立「國民參政會」以爲「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的工具。

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發表以後，各黨各派有的自動宣布取消，如中國革命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有的以公開文件讚助國民黨的行動，如張君勱領導的「國家社會黨」，左舜生領導的「中國青年黨」。張君勱於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致函蔣汪二總裁，申述國家社會黨的主義與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在精神上並無二致，今後更本精誠團結之旨，在最高領袖之下，共赴國難，以期集中抗戰力量。蔣汪二公對於國社黨之擁護政府維護民國之懇摯與坦白表示欣慰。國家社會黨的領袖與蔣汪二公的往還函件發表後，四月二十一日中國青年黨的領袖左舜生亦致函蔣汪二公，申述中國青年黨的夙昔主張與總理遺教精神相符合，願一致共赴患難，始終擁護政府，爲抗戰建國盡最善的努力。蔣汪二公復函以共同勉勵攘除外侮實現三民主義。勵勉無異。國民黨的領袖與國社黨青年黨的往來函件發表後，在國內國外都有極好的影響，在國內是表示各黨各派的精神團結，在國外則顯示中國國民黨不僅容共，而且還允許多黨存在，樹立政黨政治的基礎。

各黨各派的爭論由於國民參政會的成立告了一個段落，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摩擦，共產黨內部的鬥爭仍是相演不止。論道理，中國共產黨在已經宣佈對國民黨和中央政府投誠，或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信仰三民主義之後，就不該再對國民黨故意傷毀。中國共產黨的動作總是超乎常情以外，它既以宣言聲明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還在公開的雜誌上或秘密的傳單上向國民黨放冷箭，秘密的傳單不勝枚舉，攻擊國民黨的代表雜誌就是延安出版的「解放」。國民黨或同情國民黨的人也不甘示弱，在漢口出版的專門攻擊共產黨的雜誌，先有「游擊戰」，後有「觀察」「前衛」等刊物。後來出版的「政治周報」是純在理論上揭發共產黨陰謀的小型雜誌。雙方針鋒相對，各顯所長，定期刊物以外，還有單行的小冊子，暗遞的傳單等。不過一

總中立的觀察家全不直共產黨出爾反爾的醜惡行動。

中國共產黨內部的鬥爭那就更加熱鬧了，有共產黨幹部派與托洛斯基派之爭，有共產黨幹部派內部之爭。共產黨幹部派的主要刊物是漢口出版的羣衆，延安出版的「解放」，所謂托洛斯基派的主要刊物有西安出版的「抗戰與文化」與漢口出版的「抗戰與文化」，「羣衆」與「解放」對陳獨秀，葉青，張慕陶大肆攻擊，「抗戰與文化」與「抗戰與文化」對共產黨的醜惡也是揭發無遺。葉青來的更徹底，他除了著文辯正外，即請律師登報公開向共產黨質問，弄得共產黨閉口無言，不敢答復一句話。

中國共產黨對於陳獨秀個人的攻擊，不是對於陳氏的理論與政策有所批判，而是對於陳獨秀個人的生活與行動有所詆毀。他們說陳獨秀接受日本的津貼，執行間諜工作，因之說陳氏是「漢奸」，又因為他是托派的首領，於是有一「花匪漢奸」或「托匪」的頭銜加給陳氏及共產黨所反對的人。這種對陳獨秀先生的詆毀，引起國內一般著名學者的反感，有傅汝霖，高一涵，陶希聖，段錫朋，周佛海，王屏拱，梁寒操，張西曼，林庚白等九人簽字蓋章的函件，在「大公報」與「掃蕩報」發表，他們從陳氏生活與行動上證明他不是「漢奸」或「匪徒」。證明函件發表後，又有林庚白的否認，張西曼的曲解談話，發表於新華日報。讀者謂林張二人首鼠兩端，沒有定見，早已立身不起，而林庚白還有臉發表他的大著「國民黨站起來」呢？

共產黨爲什麼不惜以詆毀的手段攻擊陳獨秀呢？因爲陳氏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是共產黨的勁敵，共產黨早欲得之而甘心，故不惜造謠捏詞加以誣陷。還聽說陳氏由南京出獄初到武漢之時，在武昌某校講演，聽衆擠得水洩不通，教室內外全是立聽的羣衆，內中當不乏些盲目的左傾青年。當陳氏講到中國抗戰如要獲得勝利，須獲得蘇聯的幫助，如果蘇聯是革命的，蘇聯一定幫助中國。行語至此，盲目的左傾者大鼓掌，掌聲甫畢，陳氏接言，但是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

是最反動的，因此它不會幫助中國抗戰。接着陳氏以事實與理論證明中國不能獲得蘇聯幫助的見解。這個講演一發，當然動搖了共產黨在青年羣中的信仰，共產黨益恨陳氏入骨。三月間陳先生在「政論」第五期發表「從國際形勢觀察中國抗戰前途」，他說明國際陣線論是似是而非的說法，他稱贊據克里姆林宮的人爲蠢才。這篇文章曾引起中國共產黨的控告，他們上告到蔣先生之前。陳獨秀後來到了重慶又拾出建設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打擊共產黨，另節述及。

中國共產黨內部的鬥爭多年來即未休止，抗戰期間又有張國燾的脫黨。大家知道張氏是共產黨的領袖之一，脫黨後曾發表「告國人書」以揭破共產黨的陰謀。張氏脫黨以後，一時又盛傳榮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要脫黨，後爲共產黨人勸止住了。由漢口到了重慶共產黨的內部紛擾與對外攻擊仍是有加無已。

滇緬鐵路本年內完成

全綫共長五百三十哩

去年耶誕節開始敷設

本年內可完成之滇緬鐵路，全綫共長五百三十哩，爲聯接中國西南部與外界之甚重要鐵路，敷設工程，始於去歲耶誕節，從兩端起築，進行甚速，共用工人不下十萬，估計除向海外採購物料與設備之經費外，所費約需一萬萬元。

暹羅排華的由來

后亮

一、最近暹羅排華的嚴重情形

在今年六月間正式改名泰國的暹羅，她在十五世紀以前，除了和東方諸國交往以外，她的國名，在歐洲各國的外交史上，拓殖史上，根本是沒有記載的。但自世界產業革命以後，一方面因為生產技術改良，產額驟增，於是競相取得廣大的市場，以容納過剩的商品；一方面因為生產範圍擴大，原料的需要增加，於是互相爭取更豐富的原料生產地，以保障原料的供給，因此，這蘊藏豐富的白象王國，也不免被歐洲人發現而注意了。她自從一八八五年英緬甸條約（中英緬甸條約訂於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及同年中法簽訂天津條約以後，即寄生在英法統治勢力的夾縫中，至十九世紀末葉，暹羅英王輩出，銳意維新，力圖自強，國勢得以稍振。一九三二年經不流血的「六二四」革命以後，軍人勢力日見抬頭，於是產生了一種偏激的民族主義，對內多方壓迫僑居的民族，對外則力圖擺脫英法的統治勢力，因此暹羅的國際關係，日見轉變，而我僑居該國的二百五十萬僑胞亦遭受了歧視。今年動盪了反動勢力以後，政權已完全操諸少壯軍人之手，若輩竟對日戰事節節失利，因而對中國輕視之心益甚，於是飛機對毫無敵國援助的僑胞加以排斥，其嚴重的程度，為從來所未有，據調查所得，其事可分述如下：

（一）搜查銀行拘押重要行員。暹羅當局以年來我僑胞匯寄巨款援助祖國抗戰，一方面恐引起日本的不滿，他方面恐國內資金外逃，遂於七月二十五日派警搜查華僑，廣東兩銀行，并捕去廣東銀行正司理蔡星五氏，副經理賴鳳崗氏及職員一人，華僑銀行則被捕去正經理葉泰義氏，副經理孫清善氏，總司庫馬煥然氏。數人被捕以後，各團轉會即進行保釋，但未蒙當局允許，後以王等係生在馬來亞，按照英

國國籍法，為英國籍民，乃由英國駐暹公使進行交涉，至八月底始獲釋放。

（二）傳訊匯款華僑，自華僑，廣東兩銀行被搜去匯款之存根以後，警局即根據存根傳訊匯款華僑達千餘人，如果匯寄的款項係援助祖國，或匯往第八路軍者皆被拘留，聞被拘押或被驅逐出境的人約有百餘名。據當局所持的理由，謂捐款如果出於自動的，則不在佛歷一四八〇年（西歷一九三七年）統制募捐條例限制之內；但如果係屬於勸募性質的，則皆被認為違法而應予懲處云。

（三）大捕黨員，暹羅中國國民黨黨員為數約萬餘人，在暹京盤谷設有中國國民黨總支部，平時雖不能公開活動，但暗中為國効勞，所做的成績却也不差。自「八一三」全面抗戰以來，各黨員因受愛國的驅使，為祖國奔走呼號尤力，乃暹羅當局忽以此等秘密團體協助中國抗戰，有妨害其中立國策，因於四月間拘捕我駐暹總支部書記長梁士俊夫婦及黨員周日東、丁重民、葉用霖、盧仲和等七人，經警方一再審問，認為違法有據，判令還解出境。七月間，又大舉搜捕越鵝三民社，該社負責人馮利燦被拘。同月中，暹國柱日報社長，我國僑務委員會顧問陳文添氏亦遭被捕。同月二十七日黃金城、方清、溫南城亦因黨務關係被捕。八月，吳碧岩（曼谷日報社長，駐暹總支部執委）等四十餘人亦因黨務關係被捕。其後經被判出境者有之，判處徒刑者亦有之。而陳文添氏并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四）封閉華文報館。暹羅的華文報館，計有十家，平時均擁護中央，主張抗戰到底，不幸被暹羅當局認為過激。因於七月二十七日首先查封曼谷報，其理由謂曼谷日報於七月二十四日載有「日侵潮汕，我們當前應有的認識與任務」一文，有煽動旅暹華僑抵制日貨及

顯示密爾團體情實日貨的華僑，足以影響暹羅的治安及妨害暹羅與日本的邦交，故應予查封並吊銷該報社長暨總編輯及督印人等的執照。同月三十一日又查封中國報，其理由謂中國報於二十七日登載『杯葛』一文，被認爲煽動旅暹華僑抵制日貨，足以影響暹國治安及妨害暹、日邦交，被處永遠停刊，其社長暨總編輯及督印人的執照，亦被長期吊銷。同日華僑報則以二十七日發表『忠告英帝國』一文，被認爲有妨暹、英邦交，亦被處永遠停刊，其社長暨總編輯及督印人的執照，亦被吊銷。因此三大報館的被封，而連帶被迫停刊的有國民日報、新時報、華僑日報及華星日報四家；因國民日報的社長及新時報的督印人，即係曼谷日報的總編輯及督印人，而華僑日報及華星日報，則亦以與華僑日報同一主人的關係，暫時被迫停刊，謂須重行註冊，并更換負責人後，始准復刊。至八月九日下午，碩果僅存的三華文報館，又被封其二。一即爲中華日報，另一則爲中民日報。其被封的理由謂過去該兩報會代各商號刊登向救國團體道歉的啟事，認此廣告爲不合出版法，被處永遠停刊。

(五) 僑校被封四十餘間。暹羅政府因鑒於我僑校發達，有妨害共同化政策，爰於一九一八年頒佈私立學校條例三十二條，以限制我僑校之發展，一九二二年又頒佈強迫教育條例五十二條，以強迫我華僑子弟修讀暹文，一九三五年又將強迫教育條例加以修正，翌年又將私立學校條例加以修正。去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暹羅當局又根據佛歷二四七九年(西歷一九三六年)私立學校條例第二十條之規定，頒佈私立學校須用暹語教授的科目範圍準則，規定自幼稚班起至高中，除外國文科外，其他各科均須用暹語教授。該項準則於今年四月八日由私立學校科主任乃瑞哇吸正式通告各私立學校遵照辦理。各私立學校自接到此項通告以後，咸認爲如依照規定用暹語教授，殊多困難，乃先後呈文向教育部呼籲，請求予以通融，至本年六月底始得一變通的辦法，即自初小四年級起致高小二年級止，照舊授暹文

九小時半(內暹文六小時，公民一小時半，史地二小時)，至其他各課，暫准用華語教授。此事因可告一段落，惟自暹羅教育部因本年春得人民議會通過增撥行政經費二萬銖以後，又發生另一嚴重事件。因自教育部得增加行政經費二萬銖後，即將原有的教育廳改組，分設學藝及普通教育兩廳，學藝廳係由學藝局長改組，升任學藝局長披耶巴汝爲普通教育廳長，而原任教育廳長則改調任爲學藝廳長。在普通教育廳之下，增設學校調查處。由於該處的成立，查學員乃實行隨時調查京畿(Bangkok)及吞武里(Thonburi)的國立學校及私立學校。其調查的要點，包括校政、教務，而尤注意於學校的是否立案，課程的編制是否合於標準，是否用暹語教授，教員有無執照等等，如稍有不合，即遭查封，據自本年七月起至九月底止，其間被查封的華校有黃魂、新生、新中華、大同、大中、潮州、培民、育民、新民等四十餘所。現尙留在盤谷的華校，祇有十餘所了。

(六) 擬修改外僑入境例費。暹羅政府以年來我國人民因避免服務兵役或因家鄉淪陷相率而避往暹羅的人很多，認爲以前所訂的入境例費太低，殊不足以限制華人入境，移民委員因於本年八月間建議增加入境例費，擬自二百三十銖增爲五百銖，聞該項建議書於八月二十四日交國務院審查，如國務院通過，即付人民議會討論，如人民議會把此案通過，那華人更難入暹了。(未完)

乞靈孔教

紫僧

報載重慶的黨國要人和元老，在組織孔學會，要拿這種精神的文化的思想的武器來抵制共產主義思想。

我們的意見和立場則異於是。

我們以爲，堅定三民主義的立場發揚三民主義的理論可以防共。

我們以爲提倡科學發揚科學的精神和思想也可以防共。去乞靈孔教，拿二千年前一種抽象的論理的思想來防共我們以爲沒有用處。

英國在南太平洋的防衛

Donald Cowie 著
劉揚 譯

新西蘭、澳洲和英國近來召開了一個會議討論「一般有關的太平洋問題，特別着重於防衛問題」。當時世界其他各地人士，正在專注着歐局的開展，誰都不大注意這件事實，不過這個會議，至少在兩個理由上，可說是含有重大意義的。它是不列顛帝國防衛組織的一個新方案；實際上它又是太平洋國家建立聯合戰線，抵抗可能侵略的第一次有效嘗試。

直到最近幾年為止，太平洋上的均勢，一選是有利於英美兩國的。後來日本逐漸在實業與軍事兩方面伸展勢力，不願國聯的抗議接連侵略滿洲與中國，於是太平洋上均勢的重心，又逐漸的偏向對方面來了。日本的利益，就像歐洲侵略者的利益一樣，全靠它的積極的前進的政策。處在防守地位的英美，如果不是後退的話，至少是被逼得失去了她們在遠東的優先權。現在如果將她們的地位，說得多麼危險，固然是錯誤；反之，將她們的地位看作愉快，也同樣是誤解的。她們完全明白，侵略的波濤快要捲到她們身上，她們不是戰鬥便得逃避。英國在新加坡已經完成了一個主要是防禦性的軍事根據地，在遠東其他的要塞地點，也加強了實力。美國在夏威夷也同樣加強了一個相似的軍事根據地，並且預備在更西的某幾個小島上，實行武裝設防。不過這也就算是一切了。

澳洲與新西蘭愈來愈形不安。這兩塊廣大，富饒，可是居民稀疏和脆弱的英國自治領土，和她們富強的朋友是完全隔離的。她們極南的領海，便在日本的控制下面，她們最近的隣國，是荷屬東印度羣島和大洋洲。她們唯一的保護者和經濟生活來源，却是世界另一端的一個負擔過重的國家。

或許這兩塊自治領土是過份着慌了；不過日本自己的發言，也委實造成了不少的恐慌。日本的官方發言人，便聲言他們國家終極的確定政策，是向南洋擴張勢力。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日英必戰論」一書裏，著者 Yamamoto 大佐便建議對澳洲施以海空攻擊。日本的海軍，一選都想南進擴張領土，可是這種計畫，給日陸軍的大陸政策所打消了。不用說，澳洲和新西蘭都爲了這一點憂慮不止。新西蘭最前進

的政論家之一，便這樣說過：

「我們現在開始覺察到，我們的遠東，變了我們的近北了。科學逐日縮短了空間，當我們逐漸明白日本海軍擴張領土派的政策和活動的時候，我們的滿足，便老大受了擾亂。值得注意的是轟炸的途程，並不祇是橫濱到悉尼的哩數，而是帕勞羣島到新基尼的航程」。太平洋問題不單是由於地方問題。近來德意的敵視民主國家，和欺壓弱小國家，使全世界都爲之震慄不安。它的結果是擾亂了太平洋的均勢；歐戰爆發的可能性，已經使澳洲與新西蘭趕作軍事上的準備，和檢討戰略上的弱點。近來關於防衛問題的討論，便是負責研究這許多事情。這個會議是由新西蘭的總理大臣，薩凡奇先生 Savage 召集的。而以前想盡方法禁止這兩國互相商討共同利益問題的，最巧不過的，恰巧也就是這位先生。

大不列顛與她的自治領間的密切聯合，和自治領對自治領間的直接關係，常常處於敵對的地位，那是不幸的現象，看來却無法避免。各自自治領對於英國經濟優先權，一選都是競爭者，所以一向不願互相妥協。這在外國的觀察家看來，永遠是個奇怪的問題：大不列顛帝國的各單位，雖則充份明瞭她們相互依賴的必要，可是直到現在，她們都是拒絕一切締結明白規定的軍事公約。如果戰事爆發，英國已經正式負起援助某幾個外國的義務，可是她對自己的自治領，却還沒有作相似的佈置，同時她們對祖國也沒有軍事援助的義務。

不用說，我們可以解釋作她們母須明文規定這種確定的義務。不列顛的聯邦國家自然會互相援助；不過非正式的默契，沒有軍事責任的明文規定，在事變後又不能繼之以行動，那在一種完全權力政治的世界裏，常是十分危險的。近來專家的意見都堅持整個大不列顛帝國，必須採取互相防衛的同等計畫。如果要容納這樣一種合理的預備動作，各國的猜忌與抱負必須消除，不過那是一項艱鉅的工作呢。這也就是爲什麼新西蘭、澳洲與英國間的太平洋商議，是一個這樣有希望的形象。爲了大難當頭的緣故，澳洲與新西蘭已經拋掉了她們的自負，互相磋商了。那真是英國爲之感激不盡的。

這次會議是秘密舉行的，會議進行的詳細報告，還沒有公開；不過據消息靈通方面聲稱，主要的結果是建立一個「太平洋防衛會」，從事「促進南太平洋區域一切新西蘭、澳洲與英國實力的整個合作」。據可靠方面的消息，這便會由三個委員負責，新西蘭、澳洲和英國各居其一。各國再推派一個軍事代表。這一個機關下而指揮的武力，包括中國艦隊，澳洲皇家海軍和新西蘭艦隊；遠東皇家空軍，澳洲皇家空軍和新西蘭皇家空軍；再加上自治領的軍隊與英國駐紮東方及太平洋殖民地的部隊。

這次會議曾經熱慮到，如果戰時的英國，需要她在歐洲及地中海的全部實力時的問題。所以她們會討論到在這種情勢下，不必依賴英國的援助，就能獨立防衛的制度。這次會議另一件物，或許是在聯合防衛會的管轄之下，在非支羣島建立一個太平洋皇家空軍指揮部。此外防衛會又整個的統制戰時農工業資源，這樣太平洋國家食物可以自給，多餘時可以再運到英國。防衛會再由可能的意外，來研究每一個太平洋國家的經濟問題與國內問題。

將這許多討論，視作純粹是一種家事，那是錯誤的。她們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利害關係。她們好多年來，便主張在整個的太平洋區域，組織一個不單是抵抗，而且是禁遏侵略的集團。澳洲的總理在一九三七年，便建議組織一個太平洋安全公約，這是那種思想的實際表現，可惜是中途流產了。不過這樣的一種計畫，要是不能獲得美國全力的合作，永遠是沒什麼成效的。最有利關係的澳洲與新西蘭，覺到不易獲得這種合作，尤其是現在，可是他們還是深信必能最後成功的。

澳洲的新總理，孟齊斯，(Menzies)是國際上有政治家聲譽的人物。他在四月尾就職後，發表他的政綱，他說政府的第一個目的，便是和太平洋沿岸的各國，增進友好關係，「尤其是和美國的友誼」。甚至有人還提議請美國，法國和荷蘭，派遣正式的代表，出席新的防衛會。

防衛會的一切議決，已經全盤的通知了法國政府，所以一般人相信，如果澳洲在必需的時候，澳洲可以利用法國在太平洋的屬地。這種保證，特別適用於新喀利多尼亞(Nam Calédonia)，它和澳洲的海岸，相隔祇有一千英里，而在比利斯本(Brisbane)與非支羣島中間，却是一個極有價值的登陸地點。一般人還相信，澳洲正在擴張她的

軍火工業，除掉自用和供給太平洋上英屬地以外，還可以接收法政府的定單。同樣的，在太平洋防衛計畫上，與荷蘭的合作也是極端希望的。荷蘭政府或許不容易使它的歐洲中立政策，與這一種新政策調和，不過她必須計及廣大而又富饒的荷屬東印度嚴重的易受損害性。荷蘭如果加入了太平洋的集團，東印度便能獲得自動的保護了。

太平洋國家會商的消息，在加拿大引起了極大的注意。這個會議，並沒有要求加拿大自治領參加，因為關於南太平洋的防衛問題，主要祇包括澳洲與新西蘭兩個國度。加拿大政府，現今正在專注英屬哥倫比亞海岸的防務。現時防務的預算費用，大半都是化費在這一個目的上面。依照許多觀察者的意見，如果這許多計畫，能夠和英國在南太平洋的防衛計畫通盤籌劃，那對加拿大將是有利的。

最後，我們必須一述新西蘭與澳洲已逐漸能夠自行防衛的能力。因為迅速整軍的結果，澳洲現在已經擁有一支五艘巡洋艦與五艘毀滅艦的海軍。兩艘新的毀滅艦正在建造中，此外還有一支龐大的小型海岸巡防艦隊，全體人員有六千之譜。澳洲的沿海防務比前時業已鞏固得多，各處防線共有一萬名飽經訓練的常備兵，和十二萬的國民兵。第一線飛機不久就可達到二百二十架，全體空軍職員在三千以上。最近又建造了一座飛機製造工廠，每年可以出產四百架戰鬥機，必需時每年可以增加到一千架。新西蘭現有一萬二千名左右的兵士，不過照內閣總理薩奇最近的暗示，不久便可以增加到五萬名。新西蘭的空軍也擴充得很快，不久就可以開始出產軍用飛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澳洲會徵募了四一二、九五三名的陸軍，和三八、八五六名的海軍，這筆四一六、八〇九的總數，幾佔全人口十二分之一。裏邊三三一、七八一名被派至歐洲從軍，共死傷了三一八、〇〇〇名。新西蘭大概派遣了十萬名士兵，在大戰結束前不久，她還預備再派遣幾千名到戰場上去。自從第一次歐戰到現在，這幾處自治領的人口，幾乎增加了一倍，她們的財富也相等的增加了。澳洲與新西蘭，將來太平洋上的強大國家，在將來歷史裏，處於一種重要的地位。所以現時關於太平洋防務的討論，特別注重於新西蘭與澳洲兩國，希望最後能夠引起一個範圍更廣的商議。終止戰爭的唯一方法，就像歐洲民主國家最後才發覺到的，便是自身造成不可抗禦的力量，使侵略者不能發動戰爭。如果太平洋國家希望和平安全的話，她們在防衛上便必須聯合起來。

張伯倫與德蘇協定

燕妮譯

看一看過去兩年中的新聞報道與報紙，可使現在大家關於德蘇互不侵犯及互相諮詢協定的熱烈的討論，更加明朗些。判斷這個協定的一種方式，是迴憶一下，當報紙首先暗示出這種協定之可能性時，親蘇報紙上所表現出的「斥為怪說」的叫罵。不僅共產黨徒否認這種報告，就是我們這些認為蘇聯是世界上反法西斯陣線中堅的人們，也與共產黨徒一樣的憤怒，而不相信這種報告。如果互不侵犯協定，是真的「加強民主國家」，且「防止再來一個慕尼黑」——我引用這些事後辯護人的成語——則反法西斯的人，在遇到最初的這種推測時，沒有一個問及是否一個德蘇協定，或不是一個可實行的，與更較聰明的戰術，那是怪事。相反的，無論是反動派的宣傳，或我們這些認為這樣一種協定，將與蘇聯名譽有損的反對派的剛硬的思想，都不贊同前述的解釋，所有這些，都似是基本的。不過牠已被忘却了。

我可以找出一九三八年國外通信中關於德蘇間某種結合的可能性的推測的三件故事。在五月廿八日，貝德（William Bird）由巴黎打電報與紐約太陽報說，大家太不注意這兩國恢復正常外交關係這事了。他說，舒倫堡（Von Schulenburg）之回到莫斯科大使館與米里加洛夫（A. T. Merkalov）之被任命為駐柏林大使，「不能當作簡單的例行事務，無疑的，德蘇兩國關係，已轉向新的方向」。貝德覺得「對於德國最重要的事，是得到到烏克蘭麥田的通路；對史大林最重要的事，是當東方發生戰爭時，德國的機械工廠可在他的指揮之下」。這段報

告大家都不甚相信他，因為太陽報是反蘇的。同一理由，又使大家忽視了尼克波克（H. R. Knickerbocker）由布拉格打到赫斯特系之國際新聞社的六月十八日電訊。尼克波克說：據報告，舒倫堡正設法與史大林商討一種協定。他說，「在表面上」，這一協定是一個新互不侵犯協定，不過是一種要取消法蘇協定的互不侵犯協定。最近不久方簽訂的協定，正是他所說的。尼克波克繼續說兩國都否認這種傳說，捷克人則認為這是德國恫嚇英國，使之放任德國自由處理捷克的企圖。尼克波克說，「在這正在討論中的計劃的一個奇點，是希特勒提出兩個條件。第一，李維諾夫應辭外長之職，二，德國國會縱火犯，狄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應免去共產國際主席之職」。尼克波克似乎也懷疑他自己寫的故事，他說「權威方面認為史大林對於這計劃，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對於這兩個條件，更不可能了」。

另一件指標，則不是來自赫斯特系的通訊員，而是來自杜隆台（Walter Dulany），他曾被人認作克里姆宮的非正式發言人。在去年十月十日他由巴黎致紐約時報的電報中說：「現在有一種可能的事——我不說是或然的事——使英國掌權者晚上睡不好，即，德蘇行將接近，合作，而不戰爭」。杜隆台說當追問到根底時，俾斯麥常常提議的德蘇協力政策的惟一障礙，是「希特勒對於他所說的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狂熱的憤怒」。下邊就是一句嘲笑的與動人的句子。「不過希特勒並不是長生不老，並且獨裁者也可以改換心腸，還有史大林在兩年清黨期中，殺死的猶太人，遠較德國為多」。杜隆台說，如果希特勒不想學拿破崙，而看好了阿爾薩斯勞蘭的煤鐵，看不上

杜奈敦地 (Dunster Baun)。「則沒有理由可以相信蘇聯定會拒絕與德國協作，而必定要與英法共其最後命運」。這是不是莫斯科向柏林方面示意呢？或者是杜薩台說他自己的某種特殊見解呢？那時候，後者似乎是很好的解釋。不過，任何不愉快的意味，都被一月後狄米特洛夫，在革命廿一週年紀念的演說掃除了。確切的狄米特洛夫，曾警告「法西斯侵略者與英法商訂軍事協定的政策」，不過，他沒有提到蘇聯與德國接近的問題，而自己掩飾過去。他喊道，「只是和平宣言（互不侵犯協定）什麼事也作不了。要積極反抗武裝法西斯，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怪說」，並沒有完。今年的第一個，是一月十九日。這一天，紐約每日新聞登載一封來自倫敦的有版權的電報說「今晚在柏林」，「已顯示出」蘇德間之經濟軍事協作。每日新聞是簡訊。簡訊是引人注意的。每日新聞的主人是反蘇的。共產黨人讀到這段新聞，冷笑起來。每日新聞說，該協作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中，德蘇代表將於瑞典京城，或丹麥京城開會。他說這次新動作，是由希特勒自己發動的，「當新年接見外交代表時，他特別使他們驚異」，他把蘇聯大使特別約出一長時間的祕密談話。希特勒要求交換意見，對於烏克蘭問題，他提出保證。史大林答應了。「據說，李維諾夫之未能參加且內瓦國聯會議，就是由於他反對希特勒的提議。據說，史大林讓他的多年的主要外交顧問，停在莫斯科（實在已成爲囚犯）」。每日新聞說，德國準備放棄他與東京的結合；蘇俄「在去年九月危機中，被英法冷落了」，準備「去鞏固一個新同盟」。這封電報，因有許多「據聞」，「據說」，似是新聞紙中稱爲「動人故事」的標準例子。

不久，又自莫斯科來了一些指示。一月卅一日，真理報毫未加以評論的，引用倫敦雜誌紀事報之警告，說「要設想德蘇間現存的不合，必然的是國際政策中之不可變的成份，那是不聰明的」。聯合社駐莫斯科通訊員又說「真理報未能憤怒的否認可能的德蘇結合的暗示

，更使外國觀察家看重其意義」。三月十一日，史大林在莫斯科十八次共黨會議的演說中，咒罵蘇俄之敵人，努力煽動德蘇間戰爭，於是聯合社的通訊員又說，許多人認爲「因其演說着重於德蘇間沒有戰爭的真正原因，所以便似乎證明兩國間已有妥協了」。對於這個通訊員，史大林這次演說，似乎特別記起一九三四年十七次大會，人民陣線成立前一年之演說。那時候，他說，「至於德蘇關係的真正問題，絕不是新法西斯制度。他說，「自然的，我們對於他，絕無何熱心」，不過，蘇聯與意大利，確有很好的關係，儘管後者是法西斯國家。他說，真正問題，是德國國內「主張與蘇聯合作者與反對該政策者間的鬥爭」。要注意，他說到的是「合作」，而不是良好關係。事實上，與蘇聯合作，常是國社黨，德國國防軍，與工業家之一派所要求的。

二

史大林的演說，發表於三月十一日。德國軍隊於三月十五日進佔普拉格。三月十五日，是英國大陸政策的分界線。自此，「綏靖政策」，特別不受歡迎，並且英國國內要求與蘇聯締盟的呼聲，也日日擴大，終於甚至克萊夫夫教士的倫敦太晤士報，與前此親德的觀察報，也都贊同了。我想，據我們所已知道的可有兩種結論，儘管我們不能知道全部事實。第一結論，是一九三八年三月時，蘇聯並沒有絕對拒絕一個蘇德協定的意思，這裏所說的協定，是互不侵犯協定，甚或是可阻止蘇聯加入久已唱導着要樹立的反法西斯和平陣線的互不侵犯協定。第二個結論，是倫敦方面，在柏林與莫斯科，沒有讓報機關，可以某種德蘇妥協是可能的消息報告倫敦。相反的，如果在報紙上已有些消息，則我們很可假定英國情報機關，與張伯倫知道的或者更多些。假如張伯倫也與一般民衆一樣反對慕尼黑主義，則只是這些零星的暗示，也足以使他迅速與蘇聯商訂協定了。

不過，如果人們按日追溯每天的新聞報章，則人們很有理由去相信張伯倫他雖然終於對民衆壓力屈服，但在希特勒吞併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時，他確未與民衆起同樣的反應。雖然倫敦泰晤士報稱這種侵略爲粗魯的野蠻的壓迫與鎮壓行動，並且三月十五日下午議院中也有激烈的質問，但是張伯倫那一天的演說，絕對不能認作是有怒意的。他說：「我常常聽到人們對於不守諾言的責斥，這種責斥，在我看來，並沒充實的前提。今天，我不想將我自己與這種責斥結合起來，但是我必須說明，我不相信慕尼黑黑會議簽字圖，會鼓勵現在所已完成的那種不守信義的行動。不過，最後，讓我們不要偏斜了我們的路線」。他所說的「我們的路線」是什麼意思呢？克恩（Verthand Kuhn, Jr.）在致紐約時報的通信中說：「顯然的，他想繼續他的綏靖政策，不管德國給他鼓勵與否」。三月十六日，英下議院中會要求張伯倫通知希特勒，如果他侵害了「捷克人民領袖的生命與自由」，英國人的憤怒，將更加强。他答說：「我覺得要假定德政府有這種意向，那是錯誤的」。當阿司脫夫人（Lady Assol）跳起來要求張伯倫教德國政府「知道全個英國對於德國行動，是如何恐怖」時，張伯倫表現出的，較克里夫敦集團，更爲冷靜些。他沒有答覆。直到三月十七日，首相方自柏林召回漢德德大使來「報告」，並發表了有名的伯明罕演說。在這演說中，他抗議德國取消了「一個驕傲，勇敢民族」的自由，並且質問「假如對於忽視那樣堅強且當時提供的諾言的行動，是那樣的容易的發現出理由，則將來對於由同一處所發出的諾言，又怎樣可以相信呢？」自然，張伯倫是說及希特勒的諾言，而不是自己的。

張伯倫演說中的激情部份本身，似乎未足以使人們仍然認爲他喜歡綏靖政策。張伯倫本人的性情，沒有什麼傾向於激情的趨向。有許多別的事實，指明他並沒有放棄綏靖政策。德軍進入布拉格之日，英國工業協會宣佈，他的代表在杜塞多夫（Düsseldorf）與德國工業家商妥一種協定，聯合開拓出口市場，這段新聞引起許多抗議，直到四

天以後。哈立法克斯方宣布要使這協定生效所必需的政府批准，「將要且必需無期延緩」。延緩，而不是放棄。兩天以後，張伯倫暗示與德國，這種延緩，不能甚長。他告訴下院說：「英國政府，無意去阻止德國擴張對外貿易的任何合理的努力。相反的，我們常想在友好方式下，商討一種可利於兩國的商務協定，只是當前的事宜，使這種商討，停滯下來」。即在以後狂熱的幾月中，也沒有放棄「綏靖」意向的指示。五月中，張伯倫稱那故事爲「名爲重要而實無新發現的」故事之後，下院方得知英蘭銀行確已將五百萬鎊以上的捷克存款，交與德國銀行。七月中，政府先否認，終于又承認貿易部長赫德森，曾試圖以十萬萬鎊貸款去「綏靖」德國，他在最溫和的斥責聲中逃脫了。張伯倫之延不說明但澤是包含在他給予波蘭的保證之內，應認爲很重要的。給予波蘭保證，是在三月三十一日，直到七月十日，還沒有特別提到但澤。波蘭需用以購買武器的五百萬鎊現金貸款之長期鑄錢計較，絕不能認爲是要加強波蘭的抵抗力，並且這筆借款，永沒有允許。西門「強硬的」反對借款五百萬鎊與英國的盟友，波蘭；同時，赫德森又商討借款十萬萬鎊與英國的敵人，德國。

★這很可指示給我們，張伯倫政府是如何的不足置信，如果英國工業協會的協定成功了，美國出口業將大受打擊；十萬萬鎊對德借款，是要美國市場協力的；拒不與波蘭現金貸款的惟一理由，「是英國，恐波蘭將現金貸款用之於美國，而使英鎊地位，趨于疲弱」。波斯特由倫敦致紐約時報通信，刊於七月廿七日。

於此以外，張伯倫之想更進一步去綏靖德國，更表現於其時時延滯與蘇聯商定協約。因爲正如其政策之反對者在下院所說的，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則英國給與波蘭的保證，便沒有什麼價值。柏林方面提出的論證，也說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波蘭不能抵抗，且將被迫讓出但澤與「走廊上的走廊」。經過逐日記事者的檢查，我覺得終於不

能不認為張伯倫並不與蘇聯締定盟約，他所以不要與蘇聯締約的許多原因中之最重要的一個，是他希望不能訂約，可迫使波蘭屈服。我很相信到李維諾夫下台時，甚至其後數週內，如果英國要與蘇聯訂約，則條約很可締定；不過，我也相信克里姆林宮同時，也正準備與德訂約，以為與英訂約的代替。

李維諾夫辭職前的一串事實，是很有意義的。三月廿日蘇聯提議召集九國會議以反對德國侵略，英國則提議三強宣言，這宣言將是對於戰爭的警告，而不是實證。談判由此推下去。四月廿三日張伯倫突然命令漢德採回柏林任所。五月一日，英倫共產黨肩着紅旗，宣稱「英蘇——世界的希望」遊行時，紐約時報登載一段柏林通信，「德國目的在另一次小戰爭，戰勝波蘭而不與英國衝突，是德國的目標」。五月三日，英內閣決定拒絕與蘇聯盟，張伯倫通知下院他準備與德國互換互不侵犯的實證。五月四日，李維諾夫辭職。五月八日，多立舒斯 (Oho D. Tolstichus) 自柏林報告，引用紐約時報第二日的標題「希特勒將與史大林交涉，德國將以互不侵犯協定，使蘇聯中立，然後進兵波蘭」。多立舒斯說：「為要便利道希望的發展，德國政府命令各報不得攻擊蘇聯，甚至反布爾什維克的『聖戰』，亦需輕描淡寫云」。

現在，我不能詳細說明此後的複雜事件。此後我們只需注意當德國報紙以及某種程度的意大利報紙開始對蘇聯表示好感，準備訂定協定的道路時，英國的意見，愈益希望盟約成功之延滯，張伯倫更尋求一種確要得罪且激怒莫斯科的政策：在談判最緊張的時候，他與那個反蘇親日的退休外交家，林德烈 (Sir Francis Lindley) 共慶其虛華的假期；不派哈立法克斯，而派其屬員到莫斯科去；由教倫繼續發出這樣的論調，如果與蘇聯聯盟，恐將驅使莫索里尼更加強其軸心，或使日本更為敵對些，或許得罪教皇，西班牙，葡萄牙與「其幾南美國家」——而同時，德國報紙，則更公然的表示其希望與蘇聯締約。我

想張伯倫的行動，只有一種解釋，我認為恩德烈 (Guido Kistner) 七月廿一日由柏林致紐約時報的通信，很可說明這一點。

恩德烈說，德國依然希望但澤之和平的與無條件的歸還德國。或者英國強迫波蘭屈服與其強迫捷克一樣，「或者採另一途徑，德國非官方覺得因英國未能與蘇聯聯盟，將站在更堅強的，與不甚令人疑懼的立場上，干涉但澤危機。英國，因沒有三國同盟的自動條款束縛，這些德國人覺得，將可更自由的使波蘭相信其堅決保持但澤之無用，可警告波蘭現正有德蘇協作的徵象，或者，至少，因蘇聯的中立或不肯援助波蘭，波蘭自己對於德國武裝敵人惟有惟命是聽。據他們說，這事的發展，將可使英國對華沙的影響，更增加一些。……」這一晚上，多立舒斯報告說莫斯科廣播宣佈德蘇間正商討貿易協定。我相信張伯倫知道德蘇將有協約，是可能的，他並且盡力去推進牠，希望藉此可造成新的慕尼黑，或者是德波間的「小戰爭」。我覺得，這也是他還不宜戰且不實行戰爭的惟一解釋。

三

九月十一日，蓋地 (G. F. R. Gedye) 由莫斯科致紐約時報電說蘇聯對於德軍之推進，極感煩悶。「原來，他們相信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將使英法不能支持波蘭，波蘭也將被迫讓出但澤與走廊，戰爭將無期延宕」。這一點，我相信是莫斯科簽訂這協定的真正原因，因為這是沒有蘇聯援助的波蘭命運的最合理的預測。倫敦犧牲捷克斯拉夫，以使德國東進，莫斯科犧牲但澤與走廊與希特勒，以使之西進。我想「如果莫斯科不準備與柏林結盟」，則史大林將與張伯倫一樣同樣大為驚異。(I. F. Stone 作)

註：阿司脫夫，為英國親德派，克里夫集團之要角——譯者

譯自 The Nation, Sept. 23, 1939.

人間地獄的嘉善四鄉 (讀者通訊)

斐 連

發動全民抗戰，對峙了二十八個月，前線情形怎樣？後方的情形是怎樣？因為距離了我們太遠了，很難得到準確的消息，所傳出來的也是清一色不忠實的報道，所以不必去過問，也不屑去過問。

擺在我們眼前的淪陷區，在孤島的四週，現在的情形是怎樣呢？以及地方上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及軍事的動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現在就把作者最近返鄉，路過滬杭鐵路上嘉善縣境內現實情形，作一個率直的報告吧！

嘉善的城廂，從國軍西移後，由日軍駐防，有縣公署等行政機構，逐漸把戰後的劫灰整理，設法把市面繁榮，居民也逐漸歸來，大致偷能安居樂業，因為沒有加以深切的觀察，未敢武斷，至於四鄉呢？名為淪陷區，實際並無日軍駐紮，大家認為偏僻之處，是現代的桃花源，人口激增，市面加速畸形發展，經過了戰時一度紛擾，隔三個月，恢復原狀，大家相慶劫後餘生，希冀或可昭蘇。但是地方上一班莠民，就三五成羣的起來自稱游擊隊，美其名曰保護地方，勒索餉幣，「日裏游擊軍，夜間敲大門」，是他們唯一的假名害民的勾當，確切不移的斷語，更有一班游說棍徒，乘機組織所謂「抗敵會」，「抗敵是幌子，不是幌子，是認老百姓是敵，散布爪牙，一如戰前組織的縣政府，統黨政軍權於一門，造成生靈塗炭，地方毀滅的後果，雖然有黨部政府的組織，可是也奈何他不得的「地方民衆組織」，反而氣勢薰天，不可一世，宵小盤踞機要，胡作非為，民衆深墮沉淵，萬劫不復，至於他們的措施，可分政治，經濟，教育，社會，軍事，五部份來講，交織成目前嘉善縣境水深火熱，一片荒蕪的境地！

政治 對內的，先來一個巨頭會議，（祕密與公開無分彼此），手槍腰刀的爭鬥下，誰班底多（狐羣狗黨）氣力大誰就得做主席，依

次照實力的強弱，榮膺了所謂民衆代表的委員，而經過應行故事的手續選舉出來的常務委員，隨開一個高級幹部最高權限會議，分配撥兵營將担任各部處主任，各組股長員之類，對外簽起了準備收復失地的招牌，勸令各鄉鎮推負責的鄉鎮長，完成了縱的組織，那慶幸一變而動全身，第一步德政是辦理住戶登記聯保切結，說是防止漢奸，大口一元，小口五角，二十萬人口的收入，供給他們酒樓評花事，烟榻講賭經的消耗，第二步德政是辦理積穀，把鄉村存穀不給價囤藏，說是軍糧，備賑，估計各家之貧富，挨戶勸派，違以漢奸罪論，三個月後，囤糧必壞，運滬銷空，緊繫法幣，申演魔術般大小朋比化用，第三件德政築路毀路，壯丁服役掘壕築路，這是天經地義，掘毀住屋墳墓樹木，以事關軍事動作，老百姓祇該犧牲小我，不准有半句怨言，為防日軍攻擊，掘毀公路，又是老百姓應負的工作，大亨領導者，一遺命令，萬眾壯丁，盡力破壞，日軍來攻，死在機槍之下，反正是老百姓該死，大亨可以向上峯邀功報銷，斷送在掘毀公路的老百姓，先後有一萬五千餘眾冤魂，孫殿盛哉，這是孽障大著，舉一例百，在這時代，吃抗敵飯名利兼收，公侯萬代，不吃抗敵飯，真是餓子是餓桶。

經濟 凡百事業的推動，端在經濟，何況抗敵大業，有關民族存亡，所以經濟集中，是挺響亮的措施，重慶政權既來一個一切國有，上行下效，淪陷區更是天高皇帝遠，理財能手，不展長才，等待何時，（一）民欠舊賦，責令清償，二年糧銀，應該清完，為體恤民艱着田完糧，每月每畝二角，不是輕而易舉嗎，全縣七十萬畝，月收十四萬，徵收公費去百分之廿五，由主事者包辦，當地唯一工業的磚瓦窯，每日裝運出境以百艘計算，每艘納稅廿元，日進二千金，產米之區

，辦理食糧統制，以防止運糧資敵名義，設局登記，准許出口，每担納捐一元，康密與與正稅相埒，生財有大道，羨煞窮措大，其他各項雜稅，百廢俱興，日謀糊口手給零售香烟之盤，月稅二元，敲骨吸髓，磨為大觀，大亨之設局豪賭，名為振興市面，實則公開抽頭，雅片烟運銷合作，售吸日認銷數，有增無減，時代騙子的委員或常務等以權位之高下，分認包稅之肥瘠，分賦聚義，有利同享，橫掃豎壓，老百姓面現菜色，奄奄一息，兼大亨腰纏萬貫，利占大有，至於用途如何？怎樣核銷？則諱謝不敏，未敢下一字，惟主事者八個月之盈餘，在廿五萬金以上，實諸當地人士，兼口一詞，雖未敢確信有偉大數字，但該法人人會變，巧妙自各有不同。

教育：教育是救苦的生輝，不，不，決不，時代不同，教育是肥缺，縣有初中，校長位置，遂鹿者兼，即頭破血流，還得拚命力爭，查門精神可憐，教育萬歲，各處小學校長，非皇親國戚，休想站得住脚，此中利害，可想而知，總會為訓導民衆，沒有政訓機構，宣傳部門，尤為致力，日刊豆腐乾報紙，月費八百金，換戶認銷，全年每份四元，報費先收，女子宣傳，排隊唱歌兒，日間深入民間，夜間借酒伴？（不可說）有一像妖又像妖，夜夜關元宵，的流行語，內容怎樣？可以窺見，推廣鄉村教育，造福文盲，其功不小，祇是師資問題，殊嫌不夥，因為物色人才的時候並非以教育民衆前途着眼，其唯一要件，為協助收稅，校門開也罷，閉也罷，無關緊要，能使其有吸喝囉囉種種技藝，使得鄉愚俯首貼耳悉索徵賦，盡數照繳為主要任務，如此教育，吾其鄉三嘆！

社會：人們認為現代桃源的鄉鎮，經過這「當官強盜」(引用鄉人語)的榨逼，都叫苦不迭，農村呢？下種時沒有資本，千撥萬補，企候成熟，平時着田完糧每月一回的逼款，應付如狼似虎的征收人員，猶如瘟神太歲，平時夜不安枕，就心着「敲大門」的光臨，工商界呢？五花八門的新捐稅，名目繁多，那一撥不向工商界直接收割，居

民榨得透不過氣來時，遷避的遷避，無奈居住的購買力大量減低，開銷大捐稅軍營業清淡的工商界，這樣的遭受襲擊，祇有停閉或遷地為良，一般居民，萬想不到遭逢這凌遲處死的魔難，有力的逃避他鄉，一任地方的藥爛，沒力遷避的，宛轉呻吟着，相與羨居住他鄉或城廂的人們為幸福。

軍事：在理，抗敵機構的組織，首重軍事，但是事實是這樣的，保境安民則不足，為職地方則有餘，聽得日軍在某地出發，武裝的先備械逃避，平日則耀武揚威，無惡不作，同時幾個大亨，各謀穩固一己地盤，扶植私人實力，因此造成某隊係某人的武力的現象，番號紛雜，各自為政，為了匪皆嫌隙大動干戈，利害衝突，列陣火併，某隊繼其餘的械，某隊聯合某隊報復的演變，層出不窮，現在舉一個例，以概其餘，有姓薛的常務担任了軍事部份的全權，那組織之下，有一個特務隊的主事者姓程的，兩人因為派別的不同，形成水火，有一天，特務隊捕獲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四名，內中二名是姓薛的外甥和內姪，因此雙方翻臉了，姓薛的雖然權限高，但是拗不過捕土匪的正當工作，於是煽動客軍，指抗會是漢奸機關，(他本人除外)客軍馬上出動，把姓程的特務隊全隊打散，殉難者二十五餘人，經過了二個月，薛以獨攬軍權，不可一世，不意特務隊另一班長姓金的，以無端受薛的播弄，斷送了跟從多年的弟兄，於是激動了某軍，自己充嚮導，把姓薛的全家，殺個乾乾淨淨，割下了薛的頭顱，致祭殉難的弟兄，算是報復了，出這一口冤氣，單是這一場大動干戈，居民所受損害，是很可觀的了，這樣的互為因果，騷亂未已，最近范經，西塘，下甸廟，會清，洪家灘，上甸廟，天凝莊，陶莊，姚莊橋等，九鄉鎮，被日軍進擊，隊伍是逃跑了，死的是老百姓，屍橫遍野，河流變赤，繁盛市區，變成死市，一切都毀滅了，這是伊誰所賜與的呢？

最後，還有殺人不眨眼的共產黨，無風不起三尺浪，為非作歹的罪惡，罄竹難書，容整理好了，再報告給本刊讀者吧！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

國內

現在的組府問題，成了一般人注視揣測的目標，大家所注意的不是政府改組時的條件，亦不是政府改組後的工作，只是政府改組的時間。

所以一會兒傳說新政府將於某月某日成立了，一會兒又傳說新政府成立的時間又延緩了。聽到政府改組行將實現的消息，有些人是忭欣鼓舞，尤其渴望和已久的勞苦大眾。聽到政府改組延期的消息，渴望和平早日實現者不免有些憤懣，挾有私見反對和平運動者便乘機造謠中傷。其實改組國民政府，成立新政府，只是和平運動的一階段，和平工作的一部份，既不是和平運動的終極目的，亦不是和平運動的全部任務。

如果將改組國民政府視為和平運動的唯一目的，未免有些近視，如果將改組國民政府視為和平運動的全部工作，更未免有些誤解。我們曾一再聲明，改組國民政府只是和平運動的一階段，和平工作的一部份。政府改組之後，不過是使和平工作易於為力，較早實現。話又說回來，政府改組之後，和平工作是否早日完成，和平目的是否能完全實現，要看政府成立時的條件如何，如果政府成立時，能對日本取得完全平等，對國際獲得密切聯絡，則這個政府已獲得其國際上應有的地位。國際上獲得應有的地位，自可取得國內民衆的竭誠擁護。國內民衆的擁護，與國際上平等合作，關係的確立，又相因相成，相互爲用。政府改組有國內民衆的擁護，國際上較易與各國確立平等合作的關係，反之亦然。因此，組府的工作，則是對國際，尤其是對日本取得平等，對國內以民主自由的方式獲得各黨派的合作與民衆的擁護。能够如此，改組後的政府，才能够強而有力，才能

够負擔和平工作的艱巨任務。和平運動的目的遠大，和平的工作繁重艱巨，必須強有力的政府，始能勝任愉快，實現共存共榮的東亞安寧。由於政府改組後的任務與改組前的工作看來，所謂組府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求急功而組的政府，定是個不三不四的政府，與重慶的政府沒有什麼分別，更不能實現和平的遠大目的了。在組府之前，主其事各要堅守既定的正確方針，國人更應當細心考察研究，時加督促，使轉變東亞大局的新政府像個樣子，充分具備應有的條件與力量。

重慶國共的衝突日益尖銳化，毛澤東發表過支持重慶政府的言論後，引起國民黨及國人的不滿，重慶中央黨部秘書長朱家驊亦發表反對的談話，以爲答復，談話的大意：(一)中日和戰問題，乃國家大計，政府政府可自由決定，無須向共產黨方面商議。(二)中國共產黨應令第三國際指揮，無法決定其立場。(三)共產黨不聽從渝方意旨，對邊區政府未履行其宣言而予取消，且一切赤化活動至今仍形器張。(四)共產黨對內對外政策，均不合中國現實環境。(五)共產黨勒迫農民繳納苛稅，非但不能解放農民，實屬違反國法行動。(六)共產黨爲保全實力，攫奪政權，對於中日戰爭，僅外局部之游擊，從來不肯參加大規模之會戰。(七)共產黨欺騙青年學生之事實，日漸暴露，受騙青年已多數表示失望。(八)對中國共產黨之處置，乃我國內政問題，並不影響中蘇關係。這篇談話嚴正坦白，是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罪行的寫照，也是重慶國共關係演變的說明。「亡羊補牢，猶未爲晚」。「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們早就過中國共產黨是執行蘇聯的命令，以中日兩國爲犧牲。中日不打，共產黨聽任蘇聯的指揮，鼓動戰爭。中日既戰之後，共

產黨又不肯參加保衛國族的戰爭，只知利用戰爭，擴充共產黨的黨派勢力，內裏賣民衆，魚肉百姓，這陰謀不軌，希圖顛覆現政府的政權。幸而重慶的當政者，現在有些覺悟了，覺悟了共產黨的主和主義，皆不是站在中國立場，爲中華民國，中華民族作打算，而是聽受蘇聯的指揮。一念之間，相讓甚巨，既知共產黨背叛國家，魚肉百姓的罪行，亟應知而即行，以國法，以武力鎮壓共產黨的變亂，剷除共產黨的禍根。消息傳來，共產黨在重慶的機關多爲憲警封禁，這是重慶當政者覺悟的表示，盼能更進一步。

歐戰事實上已經停了，宣傳戰漸形激烈。戰爭的雙方皆奢言自己的威力，宣傳自己作戰目的的正確而偉大。本月八日希特勒在慕尼黑演說：「謂一九一四年開戰之初，一切準備均欠充分，至於今日，則本人及德國民衆，均深信英法不能擊敗德國。……英國每次作戰，均巧立名目，一曰爲小國而戰，爲公平而戰，誠然三百年來，英國爲小國爲正義而戰之結果，已取得四千萬方公里之外國土地，及四萬八千萬之其他種族人民，此即英國之所謂公平乎？再則曰英國係爲文化而戰，果爾如此，則英國似宜注意其疆區與大城市中貧民區之文化，當較從事戰爭，迫切得多。……其實英國三百年來之政策，一言以蔽之曰，屈服各國，即國際聯盟亦不過利用以保存原狀之工具耳。……英國一再允諾德國以平權及歸還殖民地，雖信誓旦旦，但諸願不果。……希氏繼在演說中宣稱，渠已命令戈林上將，準備五年戰爭計劃，此非以爲戰爭將延長至五年之謂，不過表示德國之決不屈服也。」希氏的演說不外推委戰爭的責任，表明作戰的決心。**英國說**

準備三年戰爭，希氏則以己令戈林準備五年作戰計劃爲答復。英外相哈利法克斯於七日演說：「吾人現奮鬥以求自由和平耳。吾人現抵禦危及吾人與他人安全之挑戰，吾人現維護各國人民安居樂業之權利，世有欲以暴力代替法律以解決國家間事件並破壞條約者，此亦吾人今日奮鬥反抗者也。」法國的當政者與英國一樣，渲染其作戰目的的正大與戰鬥力之強。

英法德皆在言語上逞強，英法德均沒有積極作戰的決心，所以你不打我，我也不攻你，支着架子不打，上了戰台不能跳下。在這時有荷比兩國的元首出而斡旋和平，荷蘭女王威廉明與比國國王利奧波德三世於六日進行談話之後，即聯名致電英法德三國元首，電云：「吾儕值茲苦悶時期，義不容辭，特於西歐戰事尚未極端劇烈之前，再度大聲疾呼……願爲各鄰國出而斡旋，倘供允，即請提示方法，凡爲吾儕能力所及者，莫不準備乘友好諒解精神，予以實行，俾有以便利協定之獲致。」這個電文發表後，英法德均稱讚荷比兩國元首的好意，而沒有切實答復。同時盛傳德軍集中荷比邊境，準備假道荷比，進攻英法。依戰略言，德國爲進攻法國，直衝馬奇諾防線是不智的，只有假道比利時。德國爲對抗英國，佔據荷蘭，可以便利潛艇及飛機的進出。但在形勢上，希特勒未必敢於冒此大險，而荷蘭也正準備決堤放水以卸敵人。

美國中立法於參議院通過後，於三日爲參眾兩院之聯席會修正通過。此修正案經參議院以五十二票對二十四票通過，衆議院以二百四十三票對一百七十二票予以可決。參眾兩院通過之條文於四日送交羅斯福總統，當經總統簽署發生效力。羅斯福總統又簽署命令三件，一宣佈歐洲戰爭已經存在，新中立法，應即付諸實施。二禁止各交戰國潛水艇進入美國領海與各港口。三畫出戰爭區域。英法對新中立法表示滿意，德國不滿，蘇聯也認爲係幫助英法。

遠東外交本週來頗見活躍，日本爲幫助建設中國新政權而努力，同時與美蘇進行談判。美日關係，自美國廢止商約，情形一變。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發表坦白談話後，打開美日的談判之門。同時盛傳美國將於明年實施經濟制裁壓迫日本，墨德曼更明白說出，日本報紙則開始反美。美國願意與日本調整關係，但須日本尊重九國公約所定的關於中國的原則，日本亦願與美國調整關係，但不允美國所提的先決條件。因此，談判前途，頗顯暗淡。解決的辦法，即是中國完全獲得獨立自主，進而周旋於日美之間，否則日美的關係是極難好轉的。蘇外長在演說中向日本求好，對中國則一字不提，日蘇關係的好轉有可能，蘇聯趁中日戰爭中來超撥中國更有可能。